

绪 论

以往史学界在研究思潮时，更多的是把一些主流、牵动全局的人物放在其中进行考察，而对那些敢于弄潮却不太知名的次要人物相对重视得不够。如在对早期维新思潮研究中，总体研究出现了一些成果，如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有《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思想研究》专文，胡滨有《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①一书。在个案研究中，学者对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着力尤多，^②对陈炽的研究则略显薄弱。其实陈炽是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他虽没有像康、梁那样轰轰烈烈，叱咤风云，但却以思想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在中国近代史上占应有的位置。

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王韬研究有四本专著，分别是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姚海奇：《王韬的政治思想》，台湾文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1 年版；另有王立群：《王韬研究：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北京大学 2003 届博士论文未刊本。薛福成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刘悦斌：《薛福成外交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1996 届博士论文未刊本；夏东元：《郑观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薛玉琴：《经世救国 一代俊才：马建忠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2 届博士论文未刊本。相关文章暂略。

陈炽出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年，卒于八国联军侵华之际。这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半个世纪，在这个非常时代中，陈炽追踪时代潮流，承继传统经世之学，深究天下利病，探求经国要术，勤奋著述，留下了《庸书》、《续富国策》等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传世之作。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挖掘的丰富矿藏。当时洋务运动由求强转向求富后，各种富国方案层见叠出。《万国公报》曾以“富国策”为题征文，并刊登多篇富国要策。同时代人中陈虬已有富国之策十四条，郑观应也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中将有关富国的文章放在篇首，这既反映了郑氏本人的思想变化轨迹，也是 19 世纪末国人发展资本主义，追求国富民强的良好愿望与时代要求。但从理论上系统阐发富国主张的，当属陈炽的《续富国策》。他的发展经济的宏伟构想及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理论探索，不仅时人首肯，而且为后人提供养料，成为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先声和五四时期“赛先生”传入的催化剂。^① 另外，其教育思想中的集资办学，选择僻静之地为校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倡导妇女教育，加强边疆地区教育，派人出国考察留学以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等；政治思想中的惩治腐败官吏，简化机构，以民为本等思想，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陈炽颇受时人器重，同许多名人保持着友好交往。翁同龢以“国士”、“奇士”、“通才”待之，梁启超誉其“气魄绝伦”、“甚聪明”、“异才”；马建忠颂其为“通西法者”；陈三立赞其“才雅达时变”；宋育仁把其比作“贾谊、王符”等。通过对陈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6—287 页。

炽交融的考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陈炽，同时也可更深入地剖析这段时期的历史。

因此，选择陈炽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一、研究现状

陈炽去世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备受冷落，不仅《清史列传》、《清史稿》中没有他，就是连《清代七百名人传》中也看不见他的身影。他死后，最先对其进行评价的是陈三立在 1901 年所写的挽诗。而他的生前好友赵炳麟最早为他写传《陈农部传》，短短几百字，算是对陈炽一生的总的简单的概括。^① 1922 年，陈炽之弟陈焘主修的《白溪陈氏十一修族谱》中有其所作《陈炽传》。这些都还谈不上对陈炽的研究，而真正对其进行研究，大约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最早的研究者是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唐庆增，他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撰写了《清季陈炽之劳工学说》一文，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关注陈炽思想的论文。唐庆增指出撰此文的目的是“表扬我国先哲有价值之劳工学说，使不致埋没无闻；援古证今，藉使今日研究国中劳工问题者，得以参考而有所借镜”。他认为关于劳工学说的资料，“以清季为最发达”，而在“清季经济思想之关于劳工一部份者，实以陈炽氏所言为最详尽”。所以作者选择陈炽为研究对象，“专论陈氏学说，不及他人”。文中对陈炽作了高度评价：“为人富有观察能力，眼光甚远大。著有《庸书》、

黄遵宪在《入境庐诗草》中缅怀陈炽的诗中注释里提到赵炳麟的《陈农部传》而黄遵宪卒于 1905 年，故可推知该传写于 1905 年以前。

《续富国策》二书行于世，皆系重要之作。内中文字，曾陆续转载于《皇朝经世文统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济文新编》诸书中。”虽然陈炽在“清代名作家中为晚出”，但“其所作文字，思想精密，见解高超，在当时确为不可多得之人材”。接着从五个方面对其重工思想进行了论述：一是劳工问题的重要性；二是重工的方法；三是工之种类；四是工资论；五是移民与劳动阶级。他认为陈炽对劳工问题“致力之深”，是“清代思想家对于劳工问题最有心得之一人”。唐氏的文章，开陈炽研究之先河。不足的是作者对陈炽的身世未能弄清楚，而误认为陈炽是“四川人，清光绪年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尚在世”。^①

20 世纪 30 年代，涉及陈炽的尚有金梁的《近世人物志》^②，只是摘记《翁同龢日记》中对陈炽的记载。赵丰田所写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③中，对包括陈炽在内的十几位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总体考察。在论及陈炽时，赵指出陈氏在当时即负经世之名，《庸书》和《续富国策》中的许多经济论点皆为当时该问题的集大成者。但因作者重点考察的是晚清五十年的经济思想史，对陈炽的研究也只是取其所需，使我们仍不能从整体上了解陈炽的思想体系。

1944 年郑鹤声在《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文中论及学部图书局时代的编译事业时提到陈炽与马建忠、李端棻对翻译的看法：“陈次亮之建议翻译西书，但迄未能见诸实

唐庆增：《清季陈炽之劳工学说》，《经济学季刊》1930年第1卷第1期。

② 1934年编者自刊本。

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

施”，同时提到“陈次亮农部感念时变，乃探综古今中外全局，发愤著《庸书》内外篇，其论译西书云：比年使命往来……事半而功倍者也^①。

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②中，也对陈炽进行了评价。书中对晚清以来中国人所喜爱的比附臆说之谈进行了批驳。其中他对陈炽的《庸书》做了如此评价：“当时尚有一种言论取西法而附会古书，以为乃吾中国之所固有，足为变法之障碍。其最荒谬者为陈炽之《庸书》。”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陈炽的研究渐渐增多。截至目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陈炽的研究文章共有 30 余篇。这些文章涵盖面广，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民权、教育、海防、生平考辨等各个方面。1990 年冬，在陈炽家乡江西瑞金召开了“陈炽与戊戌维新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陈炽的生卒年月、维新思想及实践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此过程中，1997 年《陈炽集》的问世，进一步推动了对陈炽研究的深入探索。现就学术界关注较多的经济、政治、思想总论等方面归纳评述。

1. 经济思想

陈炽的经济思想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现有研究他的 30 余篇文章中，有 13 篇即为剖析其经济思想的，此外一些经济史专著也辟专章专节给予阐述。其中有代表性的专著是赵靖与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③，书中将陈炽单列一

《说文月刊》1944 年第 4 卷。

上海国立编译馆 1946 年版。

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节,指出其经济思想有自己的特点,即比较广泛地谈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且开始探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生产是富国之源的观点。同时作者也指出了陈氏作为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共有的局限性。赵著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一些论著,对陈炽经济思想进行探研。令人感到不足的是,这些论述大都因袭赵著论点,而缺乏对陈氏思想内在特质的把握。

学者们还从不同方面对陈炽经济思想进行探讨,他们或从农业思想立论,或从商业、工业等角度分别剖析。马金科在《陈炽的生平及其 续富国策 》文中指出,陈炽认为“经济学说为国家富强之本学”,故他根据多年心得写出《续富国策》以促进国家富强。作者指出陈炽的经济思想中除对农业改造比其他早期维新派认识更深刻和全面外,其有关农工商矿之间的关系立论也是突出特点。^①戴金珊探讨了陈炽《续富国策》的经济思想体系后指出该书论述的国民经济问题,基本上克服了前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倾向,从而开始了向生产决定流通领域阶段的转化。^②以农业思想立论的作者指出陈炽具有近代农业经营意识,主张发展商品性农业,参与国际竞争,同时重视人与生产的作用。^③对于其商业观,学者们分析得更为具体,陈勇勤从《茶务条陈》折中研讨了陈炽的茶业近代化改革方案;

《光明日报》1989年7月19日。

戴金珊:《陈炽 续富国策 经济思想体系初探》,《经济科学》1984年第4期。

参见万振凡、黄细嘉:《陈炽农业思想初探》,《赣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张良俊:《陈炽农业思想述论》,《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刘穷志、帅冬云:《陈炽的农业集约经营思想》,《社会科学》1997年第9期;李江珉、李自茂:《论陈炽的生产观》,《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蔡晓荣则从《续富国策》中提炼了陈炽的保险思想；李正中则在考察了陈炽的商业思想后，明确指出他是近代中国重商思想的开拓者；何云鹏扼要评述了陈炽的变法护商思想。^① 工业思想论者则主要是研究了陈炽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② 这些具体的思想解剖，进一步丰富了对陈炽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陈氏经济思想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另辟蹊径，从灾荒与民生的角度进行探讨，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角。徐妍在《灾荒与民生：考察陈炽经济思想的新视角》文中，指出了陈氏经济思想和出发点多是因灾荒而起，以救治民生为中心，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从环境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地瘠民贫、灾荒迭起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一系列人口的、环境的、经济的、社会的救治措施，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也给后来的经济思想家们以特殊意义的借鉴。这种重新审视，使我们对陈氏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和启发。

2. 政治改革思想

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陈炽对议院和民权的认识。孔祥吉认为政治改革思想是陈炽整个思想体系中最精彩的部分，陈炽根据自己对西方政权制度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在甲午战后与众不同地向清廷建议向西方学习，改革政体，设立

陈勇勤：《陈炽茶业近代化改革方案》，《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蔡晓荣：《陈炽的保险思想探略》，《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李正中：《近代中国重商思想的开拓者陈炽》，《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何云鹏：《陈炽变法护商思想述评》，《当代法学》2003年第1期。

② 苏全有：《论陈炽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议院，从而成为当时众多京官中“思想最敏锐、西学最通达的佼佼者”。^①熊月之则从三个方面考察了陈炽的民权思想：一是批评君主专制，要求开设议院；二是批评文化专制主义，要求开通言路；三是反对压迫妇女，倡导妇女教育，并特别称赞陈氏的乡官民选的主张及妇女与富国之间关系论点的进步意义。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陈炽明白指出了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来改变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观点，郑享清撰文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上述主张不符合陈炽本身思想内容，指出陈炽并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他所要求设立的议院既没有立法权，也不悖于君权，故它们仍是供皇帝咨询以通上下之情的机构。

对陈炽政治思想的研究取得的一定进展，为进一步研讨提供了借鉴，但总的来说有一缺点是缺乏对比研究和历史背景的介入。

3. 关于对陈炽维新思想的评价

因陈炽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宗教、军事、国防等方面。所以有的学者从整体上对其进行研究。周辅成考察了陈炽思想的来源、内容后，指出陈氏是介于冯桂芬和郑观应之间的一位思想家，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之处。^④张锡勤著文对陈炽思想作了进一步探讨，特别评价了其经济近代化与政治改革的设想，并称赞陈氏不愧为甲午中日

孔祥吉：《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陈炽〈上清帝万言书〉的发现及其意义》，《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②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7页。

郑享清：《陈炽是否提出用西方议会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周辅成：《陈炽的思想》，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98页。

战争前后一个“具有近代眼光，能从时代潮流历史趋势的高度思考、规划中国经济变革的先进思想家”。同时指出陈炽因过世较早及极端的西学中源说阻碍了其思想认识的深化，同康、梁维新派拉开了距离，故仍属早期维新派行列。^①评价中肯 因受篇幅限制，仅谈其经济、政治改革，并没能涵盖其整个思想。刘君在《陈炽维新思想散论》中认为陈炽的经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精髓，同时是维新人士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代表，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陈炽言必称上古、秦汉，说明他对现实矛盾与激变的特殊回应，其中包含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们这种“借助传统思想的工具为资产阶级维新活动服务”的理念，“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更为彻底的资本主义改革主张，削弱了他们的思想影响力”。^②熊学文从陈炽的生平、政治理念、经济思想等方面对陈炽进行了简单评述。

另外，有的学者对陈炽的《庸书》、人才观、海防观、维新实践进行了研究。

海外史学界对陈炽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探索。萧公权在解剖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时，谈及陈氏是与康同时代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经济现代化构想的一位思想家。^⑤王尔敏在谈到 19

张锡勤：《陈炽思想简论》，《北方论丛》1999年第4期。

② 《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4期。

熊学文：《略评陈炽》，《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曾丽雅：《陈炽的人才思想》，《争鸣》1985年第2期；《从〈庸书〉看陈炽的改良主义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方世藻：《陈炽与台湾海防浅谈》，《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周晋、钟建安：《陈炽与戊戌维新运动》，《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284—287页。

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观念的吸收和融会时，提出在 1880—1895 年间求富思想有了新的转向，即出现了“步趋西化，而非沿承传统”的农业改良观念。而陈炽在 1893 年前后撰写了《庸书》，广泛讨论改良中国农业农政问题，举凡西方植物、土壤、肥料、机械等知识，养殖、畜牧、造林等技术，以及农业资本与展览和农学书刊的翻译，均有论及，确为“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的代表。^①日本学者三石善吉则从中国的千年王国的角度剖析了陈炽。他指出陈炽与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人都是“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接受西欧思想洗礼者”，具有明确的儒教的千年王国立场，提倡唐虞三代孔孟之道，认为秦以后一直堕落，“具有将今日看作‘未有之创局’的终末的思考，描绘以君民共主的议会制度为基础的近未来的理想国家图景，持有在遥远将来大同（基于孔教的世界单一政府）将出现的思想结构”，最后作者指出近代中国以儒教的千年王国的抬头为契机，“终于唤起了真正的近代的保守主义”^②。

综上所述，在不同历史阶段即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关注陈炽，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近代人物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综览以往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对陈炽的研究尚待深入。这些论著大都着眼陈炽思想的一个个层面，抓住某个问题进行阐释，缺乏对其整个思想的系统研究。而且由于陈炽长期任职于户部，久植枢垣，对某些社会问题有独特的见解，《庸书》的百篇文论，《续富国策》中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25 页。

〔日〕三石善吉著，李遇玫译：《中国的千年王国》，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71—172 页。

的论说以及维新运动时期其关注时局的文章，都是有感而发，对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史学界对此研究还不够深入。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就陈炽论陈炽，没有将陈炽放在整个晚清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同时也没有将陈炽与前代改革家，同时代的维新思想家作比较研究。另外在材料的使用上，史学界运用的主要是《庸书》或《续富国策》，对其他记载陈炽事迹的文献挖掘不够。其实陈炽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勤于著述，留给后人数十万字的精神遗产，现已由赵树贵等人多方搜集，辑为《陈炽集》公开出版，极大地方便了对陈炽的进一步研究。但是陈炽的著述并非所辑的那些，许多文章遗失。陈炽的《上清帝万言书》就很有价值，史学界除孔祥吉先生撰文予以考证和阐述其意义外，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另外，与陈炽同时代的有关学者文集中也有关于陈炽的论述，也值得注意。陈炽作为近代一著名思想家，他的思想渊源在哪里？有何特点？与同时代人相比，他处于怎样的位置等问题，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基于此，笔者力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炽的生平与思想作进一步考察和研究，以揭示其历史意义。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笔者在研究陈炽时，并非就人论人，而是将他的经历、活动、著作、思想放在整个社会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尽可能将其思想与所涉及的历史环境相联系，围绕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国近代化问题，探讨陈炽思想发展的脉络与内在底蕴。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与其他派别如洋务派、顽固派、清流派

见《陈炽集》附录。

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与其他维新思想家的比较研究，力求从共性中发现其个性，以确定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同时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向纵深推进。(1) 对陈炽的交游群体的考察。陈炽一生交游颇广，包括年轻时的诗友、维新运动时的同僚、上级及洋务大吏。探讨陈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更好地把握陈炽的思想性格，对深入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也有重要帮助。(2) 陈炽经世思想研究。陈炽作为一个经世思想家，^① 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其关注的某个问题，而没有对其思想来源作一梳理。笔者试图从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影响，阅读出国考察人员的游记和西书中译本，以及朋友的影响等方面，对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挖掘出陈炽经世思想的特征。(3) 对清末流传的《富国策》问题的考辨。利用英文原本与译本的对照比较，揭示出陈炽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和批判，探讨《续富国策》与《富国策》之间的关系。(4) 以前史学界把陈炽作为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进行研究时，多是利用他们之间的共性来说明问题，而对他们之间的异同的综合性研究尚未多见。本文通过对陈炽与郑观应、汤寿潜三人的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揭示出中国近代面临西方文化挑战的背景下，由于生活经历、接触和接受西方文化途径和社会地位不同等原因而存在的区别，以揭示陈炽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理论特质以及性格发展逻辑。

赵迺栻在《披沙录》（一）中即把陈炽作为经世学者看待（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宋育仁在为《庸书》作序时也称陈炽“湛深经世之学”；余鏞为 1898 时务学堂刊本《庸书》作序称赞陈炽“经世功深”。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法，从纵横两方面去贴近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揣摩其思想产生的背景，重视其关注的重要问题，注意运用比较研究法。

在资料运用上，因陈炽本人材料有限，笔者在充分吸收其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注意从他交往的友朋关系或相关档案材料、文集、日记、报刊中去捕捉有关信息，进行综合考察和科学归纳，坚持以整体、系统的观点出发，对陈炽的思想进行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对陈炽的研究理应包含其思想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他的富国思想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而本书主要侧重的是其经济思想与富国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 陈炽的生平与交往

陈炽（1855—1900）^①，原名克昌，改名炽，字家瑶，号次亮，又号用絜，称瑶林馆主、通正斋生。^②江西瑞金人。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举人，官至户部员外郎、军机处章京、户部郎中等职。有《袁春林屋诗》、《庸书》、《续富国策》等书传世。陈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之一，这已为大家所熟知。然而陈炽家世与早年生活以及交游情况，并不太为人注意。兹根据资料进行简要考察。

关于陈炽的生卒年代，学术界说法不一。有的人定为“？—1890”（李光灿、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有的定为“？—1899”（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对于这种模糊认识，赵树贵、曹春荣两先生撰文给予澄清。他们根据陈炽后人所保留的陈炽之弟陈焘主修的《白溪陈氏十一修族谱》中所载陈炽“清咸丰乙卯四月初七日吉时生，光绪庚子五月十三日午时歿于京都赣宁新馆”，断定陈炽当生于1855年，卒于1900年（分别见赵树贵等：《有关维新志士陈炽几个问题的考辨》，《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曹春荣：《陈炽生卒年新证》，《争鸣》1987年第2期）。另外陈三立在辛丑年即1901年为陈炽病逝所作的《陈次亮户部以去岁五月卒于京师追哭一首》亦可推知陈炽的卒年是1900年（《散原精舍诗》卷上，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本，第2—3页）。

张静庐等的《戊戌变法前后报刊作者字号笔名录》（《文史》第4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4页）谈到陈炽时有“次基”之称，误

第一节 家世

1855年，为解除清军对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围困，太平军第三次克复武昌，清廷震动。同年太平军北伐失败，但是太平军力量并未受到大损失，依然在南方拥有较大势力，与清王朝分庭抗礼。

同年，全国灾害严重。黄河在河南省下北厅兰阳汛铜瓦厢决口，滔滔河水荡没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成为近代黄灾史上的重大事件。江苏、江西、湖北等均有水旱灾害；直隶静海、新乐，江苏无锡，河南南阳等地，发生蝗虫灾害，以致“米珠薪桂，民不聊生”。^①

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已十多年，为了获得更多的权益，他们要求改约，使清统治者面临太平军冲击的同时，又要纠缠于列强的无理要求。内忧外患，令统治者头疼不已，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陈炽便出生在这一年。

清咸丰五年四月初七（1855年5月22日），陈炽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瑞林乡和塘村。瑞金，位于江西省南部，“界闽粤，丛山刺天”，“为贡水发源之区，齐云连峰，铜钵诸山，峥嵘霄汉”。^②原属赣州，乾隆十九年，赣州升为直隶州，“并割瑞金、石城隶之”，瑞金在该“州东南一百七十里”^③。鸦片战

①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② 陈炽：《瑞金合邑宾兴谱序》，《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1—302页。

③ 《清史稿》第8册，卷66，志41，地理13，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67页。

争的炮火虽然没有波及地处内陆的瑞金，但是时隔十几年后，太平军和清军的炮火先后冲击过该城。

陈炽的先辈是从宋、元时开始定居瑞金的。到陈炽出生之时，距其先辈定居瑞金已有八百多年。根据现有文献推知，陈炽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家族中没有什么高官显贵，都是皓首穷经，以诗礼传家的封建士子，世代“以孝弟力田为本，以读书为善为宗”^①，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进身之途。但是陈氏家族在科举道路上并不十分走运。陈炽说过其家族在“康熙之际，名贤辈出，富厚殷实”，但是“吾族诸公，虽复采藻掇芹”，而“科名未显”，“科第无闻”。不过他们有良好的家风，“制行均有本末，为学具有渊源”。所以当时地方官绅都乐意与之往来，“阅缙绅，授赠往来，推襟送抱，识与不识，称为望族长者”^②。据现有文献记载，其曾祖奋斗一生，只是一个岁贡生，晚年“例赐举人”，世称“陶轩先生”，有诗文集若干卷问世。当时“以文学屈一世”的瑞金知县恽敬，做官时“以法治下，处事严肃”，“为人强项负气，所至时与上官不合”^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对“陶轩先生”佩服直至，“独从之游”^⑤，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

封建时代耕读传家的传统深深影响着陈炽的祖上。陈炽祖

转引曾广玉、夏宏根主编：《江西 100 名人》，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 页。

陈炽：《宁都州城内白溪陈氏俊卿翁祠堂记》，《陈炽集》第 299—300 页。

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江苏阳湖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癸卯举人，1807 年在江西瑞金任知县，有《大云山房集》传世，其文章格调，世称为阳湖派。

张舜徽：《清儒学记》，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第 491 页。

陈三立：《清故候选教谕瑞金陈君墓志铭》，《陈炽集》，第 384 页。

父见自己在仕途上已无多大作为，就对儿子陈蔚堂寄予很高的期望。陈蔚堂（1831—1891）从小即学习勤奋，通读四书五经，“敏毅质强，覃精六籍，研披淳涵，英英挺振”。大约二十岁左右，陈蔚堂拟“应有司试”。1853年太平军进攻到江西瑞金，使陈氏族人为士子建立的寓舍被大火付之一炬，每几年一度的有司考试亦被迫中断。陈蔚堂在乱世之中东跑西藏，“转徙厓谷，凡数岁”。正是在战乱纷飞年代，陈炽呱呱坠地，来到世间。

陈蔚堂深知自己的家庭情况，既无经济实力为后盾，又无祖上荫封以持续，只得通过科举考试谋一官半职，以维持沉重的生活负担。他在战乱期间，仍未放弃学业，“手卷吟哦，不辍所学”。当时虽然有诸多有识之士对科举制度进行过抨击，但科举考试对传统士人仍旧有无穷的诱惑力。洋务运动中的大员曾国藩因自己是“赐同进士出身”而引为耻辱，左宗棠也常以终身为“举人”头衔而遗憾。“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①在这种氛围下，他的举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1864年，太平军起义失败。同年，“抚军沈幼丹奏请举行乡试”^②；同时，童试也恢复正常。功夫不负有心人，1865年，陈蔚堂考中生员，“入县庠食饩”。1873年癸酉乡试中举；“以膳录案牵引”。美好的前程似乎驾临到这位为生计奔波的人身上，他自己也跃跃欲试，准备继续奋进，因为中了举的人还想

胡思敬：《国闻备乘·科目盛衰》，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页。沈幼丹即沈葆楨。